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讲这件事情给我听的周贵良是一个很大的造船厂的厂长和总工程师。他们造了很多大船,航行在世界的海面,他们的光荣是具备无比辽阔的海洋面积的。但是他对我说:“这样的事只有你来写,我写不出来,写出来也不好看,我讲给你听。”

结果他就讲裴根了。不是那个有名的总被人引用语录的英国人培根,是我们初中时的数学老师裴根。我长大以后经常阅读培根的书,读的时候总会想,我们的数学老师也叫“裴根”。他那时应该过了五十岁,所以在我眼睛里是一个老头。这个老头一点儿也不笑嘻嘻。他总穿布鞋,也穿过几次皮鞋。他手里夹根粉笔,上课就是在黑板上写题目,计算题目,不说一句废话,他是一个完全的数学老师。

周贵良说的事情是这样的。

那是上完体育课,接着上数学课。裴老师在黑板上演算题目,他是一个把每道数学题都写得端端正正的老师,解题的每一步像是脚步,在他的粉笔里没有一丝犹豫地一个个踏出,“唰”就站成一排,接着又是一排,他把演算写成了审美,他写的时候整个后背上都是一种固执的严肃,他上课的每一节时间里都是只有数学,他不笑嘻嘻,不同学长,同学们短。

我们也必须固执地让自己没有笑嘻嘻、不讲废话地听,都能和他们的固执、严肃打成一片,学生是要和老师严肃的课堂打成一片的,可是这时周贵良和张志平没有和课堂打成一片,他们在小声说话。他们两个都是优秀学生,张志平还是团支部书记。

东京迪士尼给我留下的印象是——我们争论着花鸟馆里花草树木的孰真孰假,甚至用手去触摸仙人掌和喇叭花,最终得出的结论是“真的”。可正在此时,池塘里的鳄鱼突然敲起了鼓,随着激越的鼓点,树上所有的鸟儿居然与喇叭花一起唱起歌来。绚丽的水柱随着音量的高低变幻起伏,鸟儿的嘴与花儿口也随之夸张地一闭一合——一切都受电脑控制,一切都是假的!

那天是星期日,游人很多,像“太空探险”这样最够刺激的游览节目被告知要排队一小时。等候的时间里,扩音器不断地用日语、英语、法语以及中国普通话告诉你: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颈椎病或年老体弱、睡眠不足者不要参加“探险”;并在长长的排队路旁等距离地设下四个“中途退出”口。

入夜,乐园内的气氛更加热烈。米老鼠们热烈接吻进行花车大游行,唐老鸭们勾肩搭背在舞台唱颂歌。缀满彩灯的巨大圣诞树下,头戴毡帽、身穿礼服的一行男士正演奏着欢快的舞曲。你可拉上一个米老鼠、唐老鸭或随便挽上一个笑容可掬、娇艳绝色、金发碧眼的欧洲贵妇人来与你合影。不用花钱,所有的开销都在门票里。不过,在这里买纪念品很贵,一只中国产才几厘米长的绒布米老鼠的售价是1000日元。那些做成圆形的发出五彩光亮的荧光灯倒便宜,200日元。买了几根想带回上海,谁知第二天这些塑料管便黯然无色了。

邮票

梅子涵

可是优秀学生也会偶然地魂灵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张志平对坐在旁边的周贵良说:“啊呀,我的帽子忘记在操场上了!”他说得很轻。优秀学生魂灵跑掉的时候也是不会完全忘记课堂纪律的,何况还是在裴根老师的课堂。周贵良说:“那怎么办?”那是冬天,张志平的那顶帽子是海美绒的,蓝颜色。

结果大概是周贵良的那一句“那怎么办”被在黑板上写着数学的裴老师格外清楚地听见了。他转过身,他转身的速度不像老头,而是迅速的,生气的时候是最容易迅速的,他指着周贵良:“你又在说什么?”

周贵良站起来。他想要告诉裴老师他们在说什么,但是他没有开口。那时的学生都胆小,优秀的学生更胆小。他只要说出张志平的蓝帽子还在操场上,那么裴老师即使脑子里全是数学也不会有后来的严厉。那个年月,一顶帽子,一个小孩是不可以马虎马虎丢掉的,那时没有很多钱!

裴根戴着眼镜。就是那个时代老师们和非老师们都戴的最普通的眼镜。如果他手里没有一支粉笔,不在黑板上写题目,恭恭敬敬演算成一排排整齐的脚步,那么他其实也很像一个老裁缝。他凑近了给你量尺寸,凑近的时候不会笑嘻嘻,然后默不作声地剪,裁,踏起缝纫机。他镜片后的两只眼睛,都是很像一根直线,一是一,二是二,不往别处闪开,蛮吓人的。

老裁缝两只眼睛像直线一样看着周贵良,指着

门说:“你不要听给我出去!”

周贵良胆子不大,但是走出去时很挺直,像一个少年男人!他也是一个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很多笑嘻嘻的男生,上课的时候永远都是端正的姿势,专心的神情。可是他现在被赶出了教室。

裴老师继续上课,演算。周贵良在门外走来走去,偶尔也听得见裴老师声音里的数字,裴老师声音里是上海话覆盖住普通话,普通话只剩下真正的一点。

后来就下课了。那一天,优秀学生周贵良可能不是阳光灿烂的。我们那个学校的学生都是有很多认真,很多敏感,喜欢更多尊严的。

过了两天,裴老师让别的同学叫周贵良到他办公室去。那个时代的老师办公室,简单又庄重,谁踏进去也不敢嘻皮笑脸、蹦蹦跳跳。裴老师问:“上次课你没有听到,你有什么问题吗?”

周贵良说:“我问别的



陈丹燕

自然

当精神被周围人为的一切包围而变得虚弱委顿时,自然带来的慰藉,超过思想能给予的。青少年时代饱受人文主义影响的我,曾坚信自己的努力,坚信大写的人,坚信人定胜天,坚信城市能提供给人类更好、更优渥的生活,坚信抽水马桶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,进而,灭蚊剂也是。直到有一天,我穿上一双结实的球鞋,一直走到爱尔兰的大海边。在这里,我遇到了大写的自然。

爱尔兰濒临大西洋那壮丽的自然让我知道,人的“头文字”是大写的,而自然这个词统统都是大写。这样的自然是人的精神殿堂。

同学了,我都懂了。”

裴老师说:“我听说你喜欢集邮,我送给你一张邮票吧。”

邮票用透明玻璃纸包着,票面上是古巴英雄卡斯托罗,卡斯托罗也戴着帽子,古巴革命者的帽子。那时我们没有“偶像”这个词,可是我们都崇拜卡斯托罗。

贵良鞠了一个躬,说:

“谢谢裴老师!”

走出办公室,走向教室的路上,贵良才看见邮票的背后写着两个字:“歉意!”那两个大字也是端端正正,恭恭敬敬,是无比固执地写出的。

“歉意!”数学老师裴根是多么会选用词语。他后来了解了情况,他就把这两个字写给裴根。

周贵良说,卡斯托罗邮票现在还在。

可是裴根老师在哪儿呢?他应该有一百多岁了。如果知道他在哪儿,那么我会把这个故事寄给他,贴一张有轮船的邮票,他读了想起来,眼睛里的两根很直的线,会很软和地散发出慈祥,那个无比厉害的卡斯托罗其实也很慈祥。我没有问周贵良有没有阅读过培根,即使读过,培根给他的意义也不会超过裴根给他的邮票。

这张邮票,和周贵良后来的海洋面积的光荣是怎样贴着的关系呢?他没有说,我也不知道,那么我们就在省略号里结束吧,结束了……

灵魂的依靠

大耳

当年梁启超教育儿子梁思成,在美国不要只是研读乏味的建筑学,至少要选择一两样娱乐的学问,音乐、文学或美术都可以,让生活多一点乐趣。这一点是所有父母都应该学习的。

今天的父母都过于实际,凡对赚钱没有帮助,就不想浪费金钱和时间。然而,他们没有想过,生活里如果有了音乐、文学或美术,人就有了丰富的滋养,从而拥有鲜活的生命状态,未来的日子才有吸引力,人也会因此充满活力。这叫“趣味主义”的人生,生命因而充实和美好。

一个工作狂,徒然只懂赚钱,经济上稳当强大,生活却少了丰富的内容,无论他多么富有,那是物质上的强势,心灵的空虚将令他的灵魂无所依靠。

一个朋友问我,为什么浪费那么多时间在阅读和音乐?我没有告诉我怕无聊,只是跟他微笑。有些事情,他不会明白,比如灵魂的依靠。



非洲角马 (中国画) 杨正新

老於从任上退休后,在古镇边开了一家蒲鞋店,骄傲地展示他自己亲手做的草鞋、蒲鞋。像他这般年纪能有如此手艺,已经不多见了。钱肯定是赚不到的,他说,也算是一种传承吧。我去看了,觉得很亲切,也勾起了不少回忆。

草鞋,是稻作文化的产物。江南水乡,稻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材料,随时都可以取用。勤俭的人们很早就懂得以稻草编织草鞋。先是挑选清白干爽的稻草,剔除浮壳,稍加浸渍,用木锤一遍遍将它打熟,使之绵软,然后搓好经绳,绕在九齿架上一边搓一边编。编好鞋底后,再编一个丁字形鞋跟,这样就可以穿在脚上了。草鞋既能穿了下田劳作,在田埂上行走也能防滑。

冬季农闲,人们除了下湖隔泥,割草沤肥,就是坐在太阳底下笃悠悠地编蒲鞋。蒲鞋要比草鞋厚实,穿着舒适暖和,人们一般是上街赶集或走访亲友时穿的。用芦苇花穗编织的蒲鞋,鞋帮编得特别高,堪称御寒佳品。人们往往还会在蒲鞋底钉上两块有齿的木板,用于垫高和防滑(这是一种很古老的水履),雨雪天也能外出了。

生活在江南水乡,开门见水,有另一种“行路难”。尤其是雨天,田埂泥泞溜滑,犹如踩在了鲫鱼背上,一不小心就滑倒。或者粘得双脚像绑了泥秤砣,每走一步都要花很大力气。天气炎热的季节,还可以打赤脚,

到了西北风凛冽的季节,就必须穿草鞋、蒲鞋了。

祖祖辈辈行走在田埂上的人们,自有丰富的经验。比如要走白路,那是很多人践踏过的,不容易遇到断头浜;雨天脚板要侧走,尽量踩在草丛上,就不容易滑倒;要避开牛脚壳,水牛留下的脚印很深,一团烂泥;要当心野草丛,说不定有赤练蛇钻出来……其实,最难走是雨夜,没有一星灯光,四周犹如打翻了一缸墨汁,忘了带手电筒就难免会摔得一身泥水。我就曾经有过这种体验。然而,这些宝贵经验现在都失去了意义。乡下的路,都铺设了黑色或灰色路边,平坦如砥。早先从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,要过摇摇晃晃的

木桥,或者坐上一条两头都拴着绳子的木船,自己拉绳摆渡,走小半天的路,如今只消一脚油门就到了。想要寻找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都困难。

老於告诉我,村里的男人很多去城里开出租车了。他们的上一代,只会摇船,甚至连轿车都没有乘过,他们却把帕萨特开得满世界乱飞。女人干什么?看管停车场,一天到晚追着那些车主收费。这两份工作技术含量不高,但需要持之以恒、吃苦耐劳的精神。

我明白他指的是什么。从泥泞乡路上走出来的人们,老实本分,完全有这份韧性。但他们的下一代,恐怕会走另外的路。

陈建功的夫人也是一位编辑,对于编辑组稿的辛劳和不易,当然已是十分了解。多少年来,他在我的文学编辑工作中,给予了鼎力相助。

2000年夏天,作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的陈建功,带领张炯、顾骥等文艺评论家,由京到沪,参加备受社会关注的反腐电影《生死抉择》研讨会。我接到建功的电话后,立即到东方宾馆看望他。聊得兴起,又恰逢台风暴雨,建功就让我与他住在一起。那个暴风雨的夜晚,邻床的建功已是熟睡,我却是久久难眠。建功为人豪爽,还保持着年轻时当挖煤工人的坦诚,无论对于老一辈的作家、评论家、编辑家还是年轻作者,他都谦和而热情,他对作家们提出的困难,都尽力相助。更何况,建功和我都是兴趣相同的乒乓发烧友。

陈建功每次到沪,都会给我电话,甚至在京沪两地的电话中,就约好了乒乓交战的地点和时间。一次,建功与王蒙、袁鹰等到沪开会,竟然不参加锦江饭店的晚宴,就和约了一场球。

我俩在街边的小店吃了一碗大排面,就上场对阵。建功是横拍“大刀”,威猛逼人,尤其是他的反手台内挑打,线路灵活,速度奇快,令对手防不及防,频频失分。我的正手快攻弧圈球,往往被他迅速点回甚至对冲反带,而我直拍反面的性能怪异长胶,看着他或轻托或猛抽,游刃有余地反制于我,让我的“怪球”不怪,反倒是“自找麻烦”屡屡失分。那一次在张德英乒乓馆,令我着实领教了建功的乒乓功夫。

2001年12月,中国作协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。会前接到建功来电,说是大会简报组亟需人手,问我可否上会“帮帮忙”。我立刻明白这是给我一个与全国各地重要作家见面、交友的机会。要做一个好的编辑,就是要提倡“在场”。重要的文学活动,我们要在场;作家友人关心着的事情,我们要在场;评介推广和宣传优秀图书,我们也要在场。

2003年2月,中国作协全委会在北京机场附近的国宾馆酒店召开。建功又为我提供了宝贵的“帮忙”机会。陈忠实、石楠、冯苓植、雷达、邓刚、柳建伟、陈世旭、韩少功、陈祖芬等好友,突然发现我在会场内外出出进进,意外而欢喜。此后由文艺社出版的陈世旭长篇小说《边走边晃》、石楠长篇小说《漂亮妹妹》等,都是我约来书稿并担任责编的。

2004年8月,建功带领全国政协文教委员会的委员到沪作专题调查,我到衡山宾馆与他晤面。两人见面,心里都是热乎乎的。既然是老朋友,我俩就不只是谈文学了,个人生活和工作上的苦恼,也向建功和盘托出。建功耐心地倾听,时不时插入他的看法。对命运际会和得失,他是看得开的,他把这叫做“身外之累”,他主张“放下”,莫与名利纠缠。听他善解人意又切中肯綮的言语,我在心里说:“建功,你真是有情有义的贴心领导!”

2006年9月,由中国作协和深圳市政府共同举办“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创作工程·中国作家深圳行”采风活动中,我又有机会见到建功。就是在这次文学活动中,我初识部队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。当2008年“5·12汶川特大地震”发生后,我得知李鸣生于5月19日随“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”到得灾区时,就立即给他电话,进行约稿。这以后,就有了我和鸣生成功合作、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《震中在人心》。

建功和我,虽是几年也不定见一次,却犹如时常见面。人生道路上,友谊是上天赐予的恩典。孔夫子说:“独学而无友,则孤陋而寡闻”。建功帮我拓展了视野,抚慰了心灵,这时时可以品味的友谊滋味,也算是一种幸福吧。

友谊的滋味

修晓林



十日谈

乡野之歌

明日请看一篇《毛家菜园》。